

论李大钊的“青春中华”思想

孟凡东,王秀娟

(中央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李大钊代表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在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站在民族复兴和民族团结的角度,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提出了以“再造中国”观、“自觉中国”观和“复兴中国”观为主要内容的“青春中华”思想。他的“青春中华”思想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对于唤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初步基础和开辟复兴中国革命新道路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李大钊;青春中华;民族复兴;民族意识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8)02-0021-05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8.02.004

On Li Dazhao's Thought of "Youth China"

MENG Fan-dong, WANG Xiu-juan

(School of Marxism,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Li Dazhao represented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advanced intellectuals. In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Li Dazhao, with the clear ai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national unity, and the firm belief in everyone being responsible for the fate of his country, put forward the "Youth China" thought, which was composed of "reconstructing China", "awaking the sleeping China" and "rejuvenating China". His thought of "Youth China" had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influence on the awakening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view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opened up a new way to revive the Chinese revolution.

Key Words: Li Dazhao; Youth China; national rejuvenatio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随着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一部分爱国之士逐渐认识到救国,唤醒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忧患意识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性。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先进知识

分子站在凝聚中华民族力量、唤醒中国人的民族自觉意识和实现民族复兴的立场上,为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前途着想,分别提出了关于救国救民和民族复兴的主张,并进行实践。李大钊

基金项目: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民族大学)项目(2016BJMZTJJY0212);2016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2016MKSZYXY02);中央民族大学柏年康成基金资助课题

作者简介:孟凡东(1970—),男,黑龙江宁安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东方学、中国现代化研究。

的“青春中华”思想也应运而生。

一、“青春中华”观形成的历史条件

近代以来,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中,中国一批“睁眼看世界”、具有民族觉醒意识的仁人志士率先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觉醒,逐渐意识到中西方之间的差距,为挽救民族危亡,探索建立现代国家、现代民族大团结,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提出了力图改变中华民族处境的救国方案。李大钊面对民族危机不断加剧、救国方案不断失败的严峻时局,基于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忧患意识,提出了“青春中华”的思想。

(一)近代丧权辱国的刺激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侵华战争和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造成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遭受了西方列强的控制与支配,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局。西方列强的主观动机是为了奴役中国人民,使中华民族沦为他们的殖民地,因此,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严峻现实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救亡图存的“救国梦”成为时代主题。

(二)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失败

鸦片战争的炮火惊醒了“天朝上国”美梦中的中国人,唤醒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中国人逐渐从沉睡中醒来,开始从器物、制度、思想文化三个层面向西方学习。

19世纪60年代,地主阶级洋务派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指导思想,在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带领下开展洋务运动,试图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现代军事和经济领域的改革。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派强国梦的破灭。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只有做政治制度上的变革,物质技术的学习才能行之有效。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展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度的戊戌变法,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的君主立宪国家来挽救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但是变法因为资产阶级维新派自身的缺陷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攻很快就失败了。

1911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资产阶级共和政府,推动了国人思想的解放。孙中山提出以“五族共和”思想来建构国家转型、调适国内民族关系,但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却被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依附于革命的旧地主官僚支持的袁世凯窃取而以失败告终。

(三)忧国忧民的思索

李大钊在家乡求学时就十分关心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决心致力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帝国主义的侵略又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和民族忧患意识。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发表《警告全国父老书》,唤醒国人在民族危难之际,以自救寻求中华民族的独立。为了反驳陈独秀在《自觉心与爱国心》中提出的悲观主义思想,同时增强国人尤其是青年的民族自信心,李大钊便在《厌世心与自觉心》中告诫青年:“国之存亡,其于吾人,亦犹身之生死。”青年应该坚定民族复兴的信心,“改进立国之精神”^{[1]137},建立一个“可爱”的现代国家。

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洪流之中,逐渐从屈辱的历史现实中意识到,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民族复兴,就必须唤醒国人的民族自觉意识,肩负起“再造青春中华”的历史重任。李大钊正是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提出了他的“青春中华”思想,反映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体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厚重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二、“青春中华”观的内涵

李大钊在民族紧要关头站在时代的前列,提出了“青春中华”的救国主张,期望国人意识到此时中华民族已是“白首中华”的事实,但是在此基础上却蕴含着“青春中华”的生命力。要实现“青春中华”就要变革,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站立和崛起,就要唤醒国人的民族自觉意识,争取再造中国、复兴中国,以实现中华境内各民族的团结统一。

(一)再造中国观

1916年8月15日,李大钊在《晨钟报》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

文,论述了他的“再造青春中国”观。

文中提到:现在“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1]166},屈辱的时刻已经过去而“新棋之黎明将来”^{[1]166},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变革时期,而此时的中国已是“历史之中华,坟墓中之中华也”^{[1]167},中国已经是处于“颓亡”和“衰老”的老朽之态,不再是“天朝上国”繁荣昌盛、万国朝拜的鼎盛时期。我们不能回避“白首中华”的事实,因为依据自然的演变规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会一直处于“青春期”;国家强盛之前必然会有一段衰败的时期,同样国家衰败之后也必然会有“青春”。所以,在“白首之中华”的基础上必然会孕育着“青春之中华”,这是民族、国家的未来,也是我们理应对国家抱有的希望之所在。因此,李大钊呼吁青年人要努力奋斗,再造青春中华,而不是自暴自弃,自认中华已亡。“再造中国”需要中国人自己探索一条救国之路。

为此,李大钊希望有志青年奋发努力,“尽二十棋黎明中当尽之努力,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1]166}。“再造中国”是伟大理想,国家的独立和崛起是有志青年的大事业,理想中华与青春中华是一致的,道路不会平坦,把“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作为奋斗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以实现自我的觉醒和民族的觉醒。

作为青年人,应该知道我们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倒,“不在陈腐中华之不死,而在新荣中华之再生”^{[1]167},青年人把其“精神”贡献于民族,不在于保存“白发中华”,而在于再创中国。国人不应再怀念和留恋“奄奄就木之中华”,而应全力接受和欢迎“呱呱坠地之中华”,未来的中华是胎孕中的“青年所有之中华,理想之中华”^{[1]167}。我们的民族虽历经多重磨难却巍然独存,就在于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在于国家有一批致力于“再创青春中华”的青年。

李大钊强调“青春中华之创造,为青年而造,非为彼老辈而造也”^{[1]167}。“再造中国”需要“再造青年”,国家不允许“老辈”侵夺“吾青年独有之特权”,鼓励青年保持敏锐性,为民族、国家

创造良好的环境,最终肩负起“青春中华再创造”的历史重任,并完成这个艰巨的使命。德意志民族能够从一个分裂的民族走向统一,从屈辱走向站立,就在于青年人把实现民族、国家的统一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充分肯定了青年人在民族复兴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鼓励青年树立起再造中国的勇气。“神州之域,还其丰壤,复其膏腴”,目的皆在于培育“菁菁茁茁之青年”,希望青年充分发扬自己的爱国热忱,发挥自己的才能,贡献自己的力量,努力为再造中国作贡献。

(二)自觉中国观

李大钊又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的思想,旨在“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唤醒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觉意识,为复兴中国奠定思想前提。在该思想中,李大钊第一次将“中华民族”与“复活”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崭新的民族复兴观念,它的提出也标志着“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的基本形成^[2]。李大钊是中共党内系统阐发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先驱者^[3]。

在李大钊看来“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中华民族矣”^{[1]285}。他认为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和融合,已经“畛域不分,血统全混也久矣”,各民族之间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体,而且这个统一体是不容置疑的。同时,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性,这使得中华民族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又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来自于中国的内聚性和凝聚力。在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时,中华民族会自觉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去抗击外来侵略者,这是因为整个中华民族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内在共同体意识,在客观地起着使各民族命运与共的规律性作用^{[4]307}。

李大钊用亚洲各国家和民族“尤莫不与吾中华有血缘,其文明莫不以吾中华为鼻祖”^{[1]285}的事实来激励国人认同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史和中华民族精神,对民族充满自信,并呼吁“新中华民族之少年”把再造和复兴中国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崛起。这

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自觉,也是青年人的文化自觉。

在中华民族由自在到自觉的形成过程中“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把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文化积淀与民族自觉意识结合起来,建构各民族对于中华共同体的认同,这有利于加强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力,形成“自觉中国”的观念和意识,为“复兴中国”创造历史条件。

(三)复兴中国观

李大钊认为今后民族的问题,不再是“苟生残存之问题,乃复活更生、回春再造之问题也”^{[1]187}。因此,李大钊于1916年9月在《新青年》发表了《青春》一文,继续向国人介绍他的“青春中华”思想。李大钊以坚定自信的态度和激情高亢的语言文字,表达了“复兴中国”的愿望,这让当时沉寂的中国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和希望。

他提出了“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的观点,给国人极大的振奋和鼓舞,增强了“复兴中国”的自信心。这是李大钊对中华民族、国家未来如何发展的思考,对于当时处于迷茫期的国人来说,不失为一剂良药。它是宣告中国誓要摆脱颓亡,走向站立、崛起和复兴的宣言书。

李大钊认为“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的重任在于青年。因此,青年应把“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1]192}作为自己的历史责任。要想使青年更好地担当起“复兴中国”的历史责任,创造“理想中华”,就要使青年摆脱过去封建主义思想和陈腐学说的束缚,与旧传统划清界限。

同时,李大钊指出,地球上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生命,“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1]187}。有些人经常说中国是“老大之邦”,中华民族是“濒灭之民族”,中华国家是“待亡之国家”,这是因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我们的民族精英、国家栋梁在逐渐减少,我们的很多优秀国民已经成为白首老者,他们已经承担不起“复兴中国”的重任。但是,我们的民族、国家并没有消亡,反而

“白首国家”的衰落孕育着“青春国家”的再生和发展,我们要对当前“白首中国”充满信心,只要中国不亡、中华民族不灭,我们就有再造国家复兴、再创辉煌的希望。

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复兴、如何复兴,这些都“系乎青年之自觉何如耳”,青年才是实现复兴中国的重要力量。因此,我们的民族以后能够在世界立足。“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1]187},这是整个人类社会不断演变发展、得以再生的历史规律和条件,我们必须承认并顺应这一规律。对于青年来说,应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承担“青春中华之创造”的责任,惟有如此,才能更快地实现“复兴中国”的使命和再创中华民族新辉煌的远大目标。

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新中华民族主义》和《青春》中阐释了“再造中国”“自觉中国”和“复兴中国”的观点,形成了完整的“青春中华”思想,李大钊的“青春中华”观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青年国家”观紧密相连,突出了再造、自觉和复兴的内涵,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更为全面、完整,李大钊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初步形成。因而,李大钊的“青春中华”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深远,为实现中国人、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站立和崛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青春中华”观的历史影响

李大钊的“青春中华”思想揭示了近代中国面临的危机,他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国再创造和复兴提出的一系列的措施与方法,在以救亡图存为时代任务的历史背景下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建立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与共同抵御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的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4]35-36}。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民族意识逐步成为国人的共识和爱国热忱的体现,而忧患意识和民族自觉意识也刺激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逐渐形成。

在探索复兴中国的道路中,李大钊认识到要想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就要使他们摆脱旧

传统和旧思想的束缚,促进其思想解放。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提出了“再创青春中华”“新中华民族主义”等具有复兴意义的主张,号召国人摆脱旧传统思想的束缚,把再造中国和复兴中国当作自己的责任并努力为之奋斗终生。同时,李大钊尊重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传统,从中国历史出发,强调中国群体意识,再造“新中华民族”。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启发了民智,唤醒了民族自觉意识,并使中国境内各民族逐渐形成了在民族精神上团结统一、守望相助的民族整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李大钊是自觉而公开地标举现代“中华民族”旗帜的第一人^[5]。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强调中国历史连续性、中国整体意识和共同体意识,反映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新旧变革中的“调和”色彩,实际上就是社会变革要遵循“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不仅继承了传统民族观,而且融进了西方的先进观念。“白首中华”再生,中华民族再造,被赋予新的涵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创新,因而李大钊的“青春中华”思想赋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思想基石

中国共产党的国家观和民族观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不断丰富的。20世纪初随着各种社会思潮不断传入中国,中西文明碰撞的不断加深,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在与其他社会思潮的碰撞中,逐渐显现它对于指导中国实现复兴的重要性。

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并把它与中国多民族的实际相结合,探索在中国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中解决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路径。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青春中华”思想是“少年中国”思想的先导,并成为李大钊转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改造中国的思想资源。李大钊“少年中国”思想强调“物质改造”和“精神改造”的统一,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

“青春中华”思想和“少年中国”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思想基石。李大钊在之后提出的“民族解放”“民族自决”“民族平等”“民族联合”和“民族互助”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民族平等团结”的民族纲领和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石。“青春中华”思想和“民族平等团结”思想的统一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前提。

(三)复兴中国新革命道路思想的来源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对十月革命的研究不断深入,李大钊在“青春中华”思想的基础上,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把它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强调无产阶级应该积极发展自己的力量。李大钊认为中国革命应该走“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的道路,走俄式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这丰富发展了民族复兴的内容,开辟了民族复兴的新道路——新民主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找到了一条崭新的民族民主革命路径。

20世纪是中华民族逐渐觉醒,自觉追求民族独立、民族主权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青春中华”思想、“少年中国”思想与“平民政治”思想、“社会主义中国”思想相统一,形成了完整的、全新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对于唤醒民族自觉意识,开辟复兴中国新道路,实现民族复兴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四、结语

20世纪初期,李大钊以忧国忧民的情怀站在时代的前沿,把“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作为人生的诉求,倾尽一生致力于“青春国家”和“青春民族”的构建,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事业,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李大钊“撒播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6]。虽然时代在变化,但是李大钊的“青春中华”思想在当代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仍有巨大的指导性意义,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深刻的启示。(下转第45页)

达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近500万,使中央苏区进入鼎盛时期。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因为处境日益恶劣,决定迁移到中央苏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于1933年春到达中央苏区。博古到中央苏区后,立刻把持了中央苏区的全部权利,并把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称为中共中央局。这样,周恩来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也就不存在了。此后,周恩来主要在前方履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责。但是,周恩来在领导中央苏区期间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在对敌斗争中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军事决策,无不闪耀着无产阶级军事家的智慧光芒和体现出高超的指挥艺术,不仅指导苏区军民在对敌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而且呈现出周恩来军事决策的基本特点。由于这些基本特点也是军事决策规律性的反映,所以深刻认识和把握周恩来军事决策的基本特点,对于全面研究周恩来的军事理论与实践、深入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上接第25页)

参考文献:

- [1] 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 郑大华,张弛.近代“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形成的历史考察[J].教学与研究,2014(4):41.
- [3] 俞祖华.“中华民族复兴”观念源流考[N].

- [2]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第8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3]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M].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 [5]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140.
-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146.
-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65.
- [8]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10] 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1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11.

(责任编辑:李秀荣)

北京日报,2013-12-09.

- [4]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 [5] 黄兴涛,刘正寅.“中华民族”观念形成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N].北京日报,2002-11-11.
- [6] 习近平.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9-10-29(1).

(责任编辑:李亚平)